

 領教工坊

社会再平衡

REBALANCING
SOCIETY

[加] 亨利·明茨伯格 著

陆维东 鲁强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社会再平衡

REBALANCING
SOCIETY

[加] 亨利·明茨伯格 著

陆维东 鲁强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再平衡 / (加) 明茨伯格 著; 陆维东, 鲁强 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4

书名原文: REBALANCING SOCIETY

ISBN 978-7-5060-8168-9

I. ①社… II. ①明…②陆…③鲁… III. ①经济管理 IV. ①F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2697 号

Copyright© 2015 Henry Mintzberg

Copyright licens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安德鲁·纳伯格有限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1331 号

社会再平衡

(SHEHUI ZAI PINGHENG)

作 者: [加] 亨利·明茨伯格

译 者: 陆维东 鲁 强

责任编辑: 申 浩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168-9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推荐序 1

最高的境界是平衡

这本薄薄的小书，老先生写了至少十年。

以他的才华，几万字的小书，几天之内，一挥而就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居然写了十年，前后十几次易其稿。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十年来，苍云白狗，发生太多料所未及的事？也许皆而有之。而今，尘埃落定，这本小书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跟随他思游八极；另一方面，在老先生惊人的专业性、毅力和自制力面前，不由得又暗暗自惭。

核心思想很简单：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需要公共、私营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要努力维持好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

初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是因为政府太强，企业和公益太弱，大约2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则是因为企业太强，政府和公益太弱。这其实也是福山在他最近推出的皇皇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得出的结论。在他列出的政治秩序三个支柱“强政府、法治、民主”中，“强政府”赫然位列第一。

政府、企业、公益三大部门，分别对应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博爱”三大价值观，也大致对应西方意义上的左派（Liberal）、右派（Conservative 或 Libertarian）、中间派三大政治派别。从政治哲学上讲，这三个部门也分别对应西方三种主流理论：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学者们为了自己在学术江湖的地位，肯定是要强调其中一个角度，努力做其中一个派别的开山鼻祖或带头大哥，但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定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相生相发、相辅相成，这应该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学术和社会常识吧。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私营部门太强，通过法人政治捐款、院外活动等机制，逐渐操纵了政府部门，中国的问题显然是完全相反：政府部门太强，对经济和企业的影响太大。政府不仅是超级裁判员，随时更改游戏规则，政府还是运动员，可以自己亲自下场踢球。如果不能在形成规则的规则（所谓“元规

则”)上有所建树,中国经济层面、物质层面的成功,终究是沙上筑塔,根基不牢。美国人的补药,却往往是中国人的毒药。看了一本福山,就要在中国大力推广“强政府”,是要闹大笑话的。

政府与企业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你消我涨的自我平衡机制。企业太强,大家争相控制政府,价码出得越来越高,政府的重要性自然增大;政府太强,企业努力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与官员建立共谋关系,其实也在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逐渐瓦解政府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这两个部门的失衡,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第三部门。虽然名列第三,但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在社会底层发挥更大作用的往往是这个我们容易忽视的部门。

与欧美发达国家源远流长的公民社会、自治传统、公益习惯相比,中国的“第三部门”几乎还完全没有发展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恢复起来。1949年以来实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能政府模式,最大的负面效应恐怕是把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自治和公益传统破坏殆尽。例如,网载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基金会和民间慈善组织可能是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立的“范氏义庄”,历经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前后持续了900多年,最后居然消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果真是“金

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呀。

第三部门一般指由民间自组织的各类非政府（NGO）、非营利（Not-for-profit）单位。中国的全能政府的体制下，不用说管控最强的教育、医疗、学术类组织（传统的所谓“事业单位”），所有的基金会、协会、学会，甚至是文化、体育、科技类等民间组织，都必须找一个政府部门挂靠进行管理，所以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第三部门。最近情况有所缓解，一些地方的一些类型的民间公益组织放开登记了，但在税收等方面的具体政策的配合上，还是没有跟上。医疗领域最近改革的步子比较大，但教育领域仍是铁板一块，几乎完全成为了政府主导的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学术之死敌，莫过于官气。凡官气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独立思考、创新和创造都成了笑话，教育也成为绝大多数民众抱怨最多也最强烈的一个行业。

今日教育沉苛，当年忽视教育的第三部门性，盲目推行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上个世纪，学术界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效果远胜过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名校培养出来的那一批经济学博士（所谓的 Whiz kids）主导的南美和苏东转型。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批口含天宪、指手画脚的经济学家（第一个回国的美国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是在 1987 年）！而轮到要教育改革

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有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很奇怪，他们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场，所以什么都要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所以，很不幸，教育首当其冲，成了这个简单二分法的最大牺牲品。

有意思的是，形势比人强，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成本，把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的人们以一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起到了第三部门的横向联结作用。原来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处于“科斯地板”之下的很多大规模社会协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次成为可能。例如，各地风起云涌的私塾运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教育的第三部门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互联网产业三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百度偏政府、阿里偏企业，腾讯偏社会，三家中谁对中国未来发展做的贡献更大，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市值为标准，我们还需要有对社会起到的平衡作用的这个分析的角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平衡还需要关注两种有很强社会性的经济组织：一种是合作社，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合作社是民众以民主平等、自愿互利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中产生的最为自然、最为简单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居然一度在全能政府的狂潮中消失无影踪，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遗

憾的事情。欧美国家经济体中，各种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在经济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这些合作社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以合作者的福利为准绳，有效地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例如，丹麦、荷兰、以色列等人多地少的小国，在农业合作社的制度支持下，都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其中的以色列，更是以其“基布兹”制度，实现了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创造了现代合作社的一个制度神话。

重新发现合作社的价值，是中国的一个必然趋势。合作社重视社员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是社会企业的一种。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兴起了一股社会企业大潮。以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社会企业以经济效益为手段，社会效益为目的，用经济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不仅更具有可持续性，而且还传达了对于相关人群的尊重，发扬了这些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增长的极限是什么？经济为什么要增长？经济是什么？这些乍听之下非常匪夷所思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思考。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致力于私营和社会部门平衡的社会企业，也许是对这个问题一个最好的回答吧。

明茨伯格身在加拿大，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很自然地往南看，把美国当作了她写《社会再平衡》的主要靶子，希望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日恢复给他们带来荣耀的平衡的境界。如果他往东看，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如上所述，他应该会同意，中国也许是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需要仔细审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部门的平衡关系吧。西方国家的三个部门也许有所失衡，但从中世纪的城邦国家起，他们的市场、市政厅和教堂之间的铁三角关系就已逐渐成形，直到演进成今日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之间的三角关系。三者的相对关系或者偶有起落，但正如三角形的两条边之和大于第三条边，三者中任何一者无法完全压到其他两者的联合。像中国这样一“腿”独大，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抱着权力的大腿讨生活的情况，应该是超出绝大多数西方人思维框架的事情吧。家丑可以不外扬，但我们的任重而道远，是谁也无法逃避的事。

肖知兴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学院院长

推荐序 2

历史尚未终结，思考仍需继续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推出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一定认为自己智珠在握，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样貌。但是，鲜少有人知道，仅仅三年之前，福山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的同题论文（《历史的终结？》）的题目上是有一个问号的。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三年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福山在短短的三年中，敢于把一个怯生生的疑问句彻头彻尾地转换为确凿无疑的定论呢？

显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紧随其后的东欧剧变，让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论家得出了“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判断。

福山这样写道：“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

者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终结，它同样也是如下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体制的最终形态的普及化过程。”

历史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思考的终结，因为既然“资本主义不仅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甚至永远是最好的制度”（福山语），全世界的人们哪里还用得着耗费心神，思考未来呢？只要坚决照搬或坚定维护资本主义就足够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和福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素以叛逆性思考著称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并未放弃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至少在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所谓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公司化社会。私营部门成为社会的主宰，甚至达到了任何现有政治活动无法驱逐的程度。

公司攫取了前所未有的特权，却承担着越来越少的社会责任。在1952年，美国税务总额的32%是由企业承担的，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却跌到了令人不安的9%。更为甚者，一些大公司肆无忌惮地利用法律或政府监管的漏洞毫无廉耻地大赚其钱。比如，华尔街巨鳄高盛公司利用一个海关商品交易所价格监管上的漏洞，仅仅通过把铝锭在几个不同的仓库间转运、

储存就在三年内赚到了 50 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 1% 人群的财富急剧增长，其他人的财富增长却严重滞后。

明茨伯格尖锐地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不存在集体的“我们”，但正是集体意义的“我们”正在遭受生态上、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威胁。“我们”正受制于个人主义，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机构都在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利，胜过对社会需求和正遭受威胁的地球的关心。

其实，明茨伯格并不是第一个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失衡的智者。早在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林肯就发出了感慨：“一些公司（通过南北战争）已经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财富能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样共和国将会覆灭。希望上帝保佑我的这些怀疑都是毫无缘由的。”

在林肯之前，一位苏格兰的智者弗雷泽·泰特勒从广谱的层面提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平均寿命是 200 年，伟大的国家兴盛又衰落，人们从受奴役到获得精神上的真理和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富足，从富足到自私，从自私到自满，从自满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重新回到受奴役的状态。

从泰特勒总结的 200 年周期律来看，美国社会运行走向失

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1989 年是美国建国 200 周年，也许当福山等人欢呼“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那一刻，却正是资本主义走向下坡的开始。始自美国，席卷全球的 2008 年金融危机或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事实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宣称历史的终结（也隐含着思考的终结）的福山本人并未停止思考。

福山显然也看到了公司大而不倒、政府力量严重削弱的资本主义失衡之弊。在他 2014 年的新著述中，福山提出，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 2008 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 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福山也不得不自承“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

福山的认知转向正与忧心忡忡的明茨伯格发出的“社会再平衡”的大声呐喊遥相呼应。

明茨伯格从已成思维定式的二元对立论入手，认为人们必须从深陷的左派与右派、国家与市场、国有化与私有化、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严重争论中摆脱出来，不要再在两个极端之

间徘徊挣扎，而是要致力于在政府、市场与社群这三者之间营造社会的再平衡。

明茨伯格尤为看重社群领域的这第三条腿在重建社会平衡中的作用。在他的定义中，社会领域包括了全部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的社团。这其中一些为其会员所有，其余的则不为任何人所有。

明茨伯格以巴西为完美样本展开了描述。在他看来，巴西有积极果敢的政府、世界级的大企业和活跃的社群。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实现了良好的成效。比如，在应对艾滋病危机上，巴西就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0年，世界银行预计此后十年巴西将会有120万艾滋病患者，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还不到60万。明茨伯格相信，巴西人已经实现的创造性社会变革也有望在美国得到复制。只是，美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两个世纪以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将新兴的美国形容为一个满是社区协会的国家。美国人的这一社群意识让托克维尔视为美国式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的最佳样本。但是，两个世纪之后，尽管明茨伯格对社群领域寄予厚望，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却用一本《独自打保龄》，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式社区的解体。

那么，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的期望是不是会随之落空呢？

其实，明茨伯格看到了症结所在，看到了解困方向，却忽略了另外一支勃然而兴的强大力量。

这就是经由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全新社群。尽管传统的社区组织已经没落，但互联网社群却以指数级增长的态势火速成长。

当然，考虑到明茨伯格年近八旬的事实，他的这一忽略是可以理解的。而最重要的是，他洞察到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的方向。这已经弥足珍贵了。

1776年，汤姆·潘恩在他的小册子《常识》中激励美国人说：“我们有能力让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基于互联网社群的力量，明茨伯格的期望也许并不会落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全世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必将重新开始。

只是，我们再也不能像福山那样轻率地下结论了。因为，历史尚未终结，思考仍将继续；社会尚未平衡，人类仍需努力。

陈禹安

心理管理学家

基本观点

够了！

受够了社会的不平衡正在摧毁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地球和我们自己。

受够了左派右派的钟摆式政治以及政治中立派的无能；受够了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伸出的有形的政治游说的魔爪；受够了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和地方社区的削弱。我们是不是过于剥削了这个世界的资源，包括我们自己这些所谓的“人力资源”？

许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问题，但付诸行动的不多。人们的意愿已经有了，但对现状和解决方案的探究还远远不够。我们